

华侨三代与祖国的亲情

中

国民党反动派一直对进步教育事业恨之人骨,以“升旗事件”为由二次逼董事会将祖父解聘。祖父始终坚信“进步教育事业才能启迪后代明辨是非、不忘历史。这是大势所趋,是破坏不了的。”

据祖父的学生何禹先先生回忆祖父在广仁学校担任教务长时正值新中国抗美援朝时期,他坚定地实践爱国执教,在六年级课堂上给学生讲述美帝国主义如何霸道和侵略他国,教育学生们抵制美货,不要送钱给他们杀害中朝人民!讲到高潮时他突然同全班同学:“你们同意吗?你们愿意送钱给美帝杀害自己的同胞吗?”全班同学异口同声高呼:“不愿意!”时隔半个多世纪,这些当年的娃娃们依然清楚地记得夏老师教育他们爱国的情景。

因祖父在印度尼西亚华人教育界的影响力和对中共革命的突出贡献,1961年他受到了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和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的亲切接见。

父亲的故事——归国报效、翻身无悔

上世纪30年代,父亲夏之秋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市。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随着



1976年父亲(右二)与原印度尼西亚巴中校长司徒赞夫妇(左一左二)、方定勋老师(右一)合影

祖父辗转多地求学,也深受祖父爱党爱国行动的熏陶。由于印度尼西亚是种族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的殖民地国家,父亲从小就深切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由于肤色国别不同,存在的等级和歧视。父亲曾告诉我:就算生活在一个街区,住一样的房子,男孩子们打起架来,荷兰孩子也会叫嚣“我们是上等国家上等人,你们都是下等国家下等人!”更有甚者,华人在多次排华事件中受尽原住民欺侮:华人家庭被抢劫并烧毁,华人妇女被强奸、屠杀;许多华人处境朝不保夕。由于歧视,大多数印度尼西亚华人虽然在商界身价不凡但在政界毫无地位,也无法通过司法机构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只能靠四处花钱来消灾解……所以回归祖国、建设强大的祖国是父亲从小就立下的志向。

1949年4月21日,

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下,一举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解放广大国土,国民党反动统治遂告覆灭。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不仅是共产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也是全球华人为之振奋的时刻!大批有识之士抛下海外殷实富裕的生活,投身于新中国艰苦卓绝的建设洪流中!

1952年正在大学读书的父亲放下学业,离开双亲,意气风发地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归国。新中国当时处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时期,要发展民族工业必然离不开能源。鉴于石油、矿产、煤炭资源的匮乏急需勘探人员,于是父亲弃文从理,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地质勘探专业学习。1956年大学毕业后,他就跟祖国大地结了缘,在各地荒山野岭风餐露

宿,勘察地质地貌,为祖国寻找矿藏。“当时的设备十分落后,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常年过着风吹日晒雨淋、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可他依然苦中取乐,忘我工作。那个时代的人都有有一种战天斗地的精神,心怀理想的人不畏物质贫乏,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还有更大的精神磨难在等着父亲。

从1950年代起,中国开始了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党内整风、反右派斗争等一系列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也被扣上美蒋特务的罪名而入狱5年,直到1972年11月得到他的恩师、毛泽东主席的同学、全国侨联主席张国基先生的证明与帮助,才得以平反和释放。但是出狱不等于可以回北京工作,他在河南省郑州师范学院执教了一段时间。父亲的人生轨迹,是许许多多归侨的典型,类似他经历的人还很多。可以想象一个热血青年,从海外归国参加祖国建设,变得举目无亲,还背上莫须有的罪名,内心是何等的痛苦和孤独!

记得我中学时曾经问过父亲:“您放弃印度尼西亚的优越生活,回到中国搞勘

探,又苦又穷还被关监狱,觉得自己傻吗?后悔吗?”父亲当时沉吟了一下说:“傻,但不后悔!因为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祖国羸弱,我们在国外过得再富有也如丧家之犬!”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1978年改革开放,我们一家人也终于回到北京过上了平静安稳的生活。父亲就职于中国国土资源部地质情报研究所。他的后半生不仅是一位地质学家,也是一位“博物学家”,他掌握英、俄、日、印度尼西亚语四门外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地理知识涉猎甚广。记忆中的父亲总是在书籍满满的书房里伏案写作,除了大量地质专业论文外,他还是《参考消息》《北京晚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南方周末》等十余家知名报社的撰稿人,长期在报刊上刊登形形色色的议论、小品和杂文,题材涉及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多地的风土、人情、物产、历史等。他还研究了印度尼西亚历史、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交往史,写成了《了解印度尼西亚,促进睦邻》系列文章,其中33篇杂文被南通华侨博物馆收录成册《椰风蕉雨札记》。